

讲信修睦：君子处世之道 国家执政之基

□ 李炜永

讲信修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是目前所见“讲信修睦”最早的出处。所谓“讲信修睦”，就是人与人之间要重视诚信，进而和睦相处。“讲信修睦”的首要思想是诚信。《说文解字》云：“诚，信也”“信，诚也”。“诚”与“信”一体两面、互为印证，故而构成合成词“诚信”。当然，若仔细深究，“诚”与“信”在内涵上也有差别。诚的本义是真实无妄，强调思想上的真实或内心的诚实；信则更强调行为方面，要求做事诚实守信。简单来说，诚是本质，信是表现，所谓“诚信”，体现的是内与外、体与用、哲学与伦理的统一。

中国古人十分重视诚信，并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积淀成为一项基本道德规范。孔子说“信以成之，君子哉”，就是说靠诚信取得成功，这才是君子呀。孔子还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形象地将诚信比之车子的关键部件，丧失诚信的人，就像“大车无輹，小车无輹”一样，终是无法“上路”的。“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益者三友”，要与讲诚信的人交朋友。《后汉书·朱晖传》载：东汉时，朱晖、张堪同为南阳名士。张堪早知朱晖讲信义。原素不相识，后二人在大学相见，张堪把朱晖当朋友看

待，并将妻儿托付于他。张堪英年早逝，他的妻儿生活非常艰难。朱晖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年复一年资助关心他们。朱晖的小儿子觉得奇怪，便问，您过去和张堪没什么交往，怎么对他的家人如此关心？朱晖回答说，我跟张堪的确相交不深。但他“尝有知己者言”，“吾以信于心也”，我又怎能辜负这份信任呢？与结交，也要讲诚信。尽管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但一旦参与经商，即要遵循“市贾不贰，国中无伪”“童叟无欺”的准则，即商业经营活动必须诚实守信。

讲诚信同样是立国之本、执政之源。《论语·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是说当政者必须取信于民，单纯一旦失去民众的信任，也难以立得起来。南宋朱熹说：“无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虽商鞅之徒亦不可为政。”在他看来，诚信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要求，更是国家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推而广之，国家交往也应该讲信义。管子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即诚信是团结天下人的纽带。而像有的国家那样，为一己之私之利，屡屡背信弃义，说一套、做一套，也必失信于国际社会，失道寡助，寸步难行。

“讲信修睦”的另一重要思想是“睦”。《说文》云：睦，目顺也，一曰敬和也。《广韵》：亲也，敬也。《六书故》：睦，目谐也。凡人喜愠，必形于面目，故和为睦。可见，“睦”多与“和”相通，即和睦、和顺、友善。中国人给人的印象就是温文尔雅、亲善友爱，这是由中华文化内倾性的特质决定的。与西方诸民族“好战健斗”的特点不同，中华民族崇尚“中庸和平”。比如，儒家讲“仁”，强调“仁者爱人”，即在道义和情感上人们应相互尊重和关爱。讲“中庸”“中和”，很大程度上是“抑其血气之刚”，从而使人的生理与道德理性合为一体。此外，道家强调“不争之德”与中道思想，墨家强调“兼相爱、交相利”，这些都对塑造中国人的性格产生了很大影响。日常生活实践中，中国人也历来重视和谐对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讲究“家和万事兴”，不仅夫妻之间、长幼老弱之间要和睦，而且朋友之间、同窗同事之间、进而陌生人之间都要和睦，万事以“和为贵”。

由于中国文化是和平宽大的文化，由此塑造的中华民族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儒家倡导“民胞物与”，以善心对待一切；老子强调，“兵强则灭，木强则折”“不以兵强天下”；墨子认为：“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并说：“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

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纵观历史，中国重文轻武，崇拜圣人超过崇拜英雄，军事战备多是用于自卫，很少用武力去侵略、压迫和吞并弱小民族。即使与异国的战争，也往往是在迫不得已之时才起而抗战，极少主动挑起战事。

讲信修睦的道德伦理观主要源于古典的农业社会，因此当下要弘扬讲信修睦就必须赋予其当代的意义，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现实生活中有种种违背诚信甚至恶德的事情就否定这套常道的价值观。上升到国际层面，恃强凌弱、零和博弈是行不通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面对局部地区冲突、疫情、环境保护等全球重大问题，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立面对。以诚待人，讲信修睦，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美美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我们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真正出路。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道德追求

天下兴亡，“匹夫”怎样才能“担责”？在顾炎武看来，明朝亡国教训在于先“亡天下”然后“亡国”，而“亡天下”根本原因在于，士大夫寡廉鲜耻，丧失德行气节，导致士风世风败坏。因此，他提出“风俗者，天下之大事”，认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在他看来，维持世道人心既需要经济基础和制度支撑，更需要道德引领与规范。因此，“保天下”就要净化整个社会的风俗道德。他认为，培养良风美俗，既要培养孝悌忠信，又要注重礼义廉耻，还要崇尚名节、尚厚重。而改变社会道德风气人人都有责任，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为此，他大声疾呼，个人立身处世要坚持“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准则。

为学要坚持“博学于文”的道德准则，有所作为。“博学于文”出自《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孔子认为，君子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再用礼约束自己，就不至于离经叛道。顾炎武继承了这种治学方法，但他提倡的“文”，范围更为广泛，既指文章、文字，更指待人接物、立身处世之道，既指自然科学知识，更包括实践知识。在他看来，治学的最终目的就是经世致用。只有认真学习“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的知识，才能做“有益于天下”的有为之事。

为人要坚持“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有所不为。“行己有耻”出自于《论语·子路》，意思是人要用羞耻之心约束自己的行为。顾炎武把“行己有耻”作为做人的基本准则。在他看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中，“明耻”最为重要。人有廉耻之心，国家才能形成知荣辱的道德风尚。他还特别指出，廉耻于士大夫阶层来说，尤为重要，并强调“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顾炎武认为，“有耻”是个人行为的底线。因为知耻才能自觉羞愧，自觉羞愧才能恪守礼义，恪守礼义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也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基础所在。



（上接1版头条）

扎实推进加快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做好新时代新征程教育工作、加快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重大部署，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采取更为有力的贯彻落实举措，一步一个脚印把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付诸行动、见之于成效。

坚持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树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落实德育为先，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将党的二十大精神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和专业课教育教学。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全面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大力发展素质教育，更加重视儿童青少年的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不断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让孩子们学会学习、学会共处、学会做事、学会做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和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工作，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抓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工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多次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锚定2035年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目标，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构建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在更高水平上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出贡献。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健全控辍保学长效机制。发挥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持续深入推进“双减”工作。强化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普惠发展，完善普惠性幼儿园和特殊教育学校布局规划，加强保障能力建设。坚持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加强县

（上接1版二条）主体全覆盖，是指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在党规党纪面前一律平等。特别是要抓住“关键少数”，管好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贯穿全过程，是指全面从严治党的每一项工作都重在细节、重在过程，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每个阶段，重点抓哪些、抓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效果都要具体明确，体现管党治党高标准、严要求。

健全关键在严、要害在治的体系

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管党治党，必须严字当头，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要在“严”上持续用力，营造严的氛围、采取严的措施，不断丰富和深化从严管党治党的方式手段。一是抓党内政治生活从严，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严格尊崇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进一步完善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巩固和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二是抓思想从严，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三是抓抓制度从严，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长远之策，是管党治党的基本方式。及时填补制度空白，不断提高党内法规制度的质量，确保各项制度立得住、行得通、管得好。加强备案审查和清理，维护党内法规制度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切实提升党内法规的执行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好转化为治理效

域普通高中建设。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不断提高资助水平和精准度。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有效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打造国家战略人才和战略科技力量，推动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高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全方位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部署国家关键领域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加快卓越工程师培养，加强优秀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加快造就更多拔尖创新人才。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打牢支撑科技创新的学科专业基础。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卡脖子”问题，推动高校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实现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突破。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推动高校参与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重大科学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升高校咨政服务能力，高质量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断增强教育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坚持问题导向，勇于打破观念束缚和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发广大师生员工的创新创造活力，加快解决制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更加注重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充分发挥教育评价改革的指挥棒作用，坚持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建立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长效机制。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坚持依法治教，全面推进教育工作法治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拓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教育对外开放格局，不断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教育数字化，加快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步伐，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打造成教育领域重要的公共服务产品，构建数据驱动的教育治理新模式，不断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助力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

四是抓治吏从严，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五是抓组织从严，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把各领域广大党员组织凝聚好，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组织凝聚好，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把各领域广大党员组织凝聚好，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六是抓作风从严，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七是抓反腐败从严，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以改革精神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发挥巡视利剑作用，注重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全面从严治党，要害在治。“治”不仅要解决治什么、怎么治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谁来治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之前一段时间，为什么从严治党在不少地方效果不好、成效不大，关键就是管党治党的责任主体不清、问责力度疲软、激励机制缺失，使得一些党组织在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忘记了自己作为政治组织的本分，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治功能和优势。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下决心破解这一难题，就是要抓住管党治党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将管党治党的所有要求都变成硬性要求，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并久久为功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的习惯和自觉。一方面，各级党委（党组）要承担好主体责任，把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承担好、落实好，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坚决防止“一手硬、一手软”；另一方面，纪检监察机关是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专责机关，必须聚焦中心任务，监督执纪问责，更好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主任、教授）

顾炎武为什么能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满新英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爱国名言可谓家喻户晓、影响深远，其源于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日知录·正始》。这句语言简意赅地指出个人应对国家兴亡承担责任，对激发中华儿女的爱国精神和责任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数百年来，成为我国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

“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正始”是三国时期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正始年间，正处于魏晋易代之际，朝政黑暗腐败。为逃避灾祸，魏晋士人只好消极避世，“清议”逐渐转为“清谈”，玄学开始兴盛，史称“正始之音”。顾炎武认为，魏晋风流名士崇尚清谈，“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导致儒家主流价值观崩溃，从而导致“国亡于上，教沦于下”。他深感明末心学

空谈误国，明朝灭亡与社会各阶层未尽到道德伦理责任有关，因而倡谈正始之风，反思明朝灭亡原因，发出了“亡国与亡天下奚辨”之问。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和“天下”常被作为同义语使用。但顾炎武认为，“国”和“天下”存在本质差异，“亡国”和“亡天下”不能混为一谈。在他看来，如果整个民族礼义丧失，道德沦丧，文明堕落，将天下不保。在这里，“天下”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天下，而是指维系社会秩序的文化。在区分“亡国”和“亡天下”的基础上，顾炎武进而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保国”和“保天下”息息相关，维护社会道德和文化传统以保天下，是“保国”的基础。其次，“保国”和“保天下”的责任主体不同，“保国”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而“保天下”是捍卫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道德风气，每位普通人都有关不容辞的责任。因此，顾炎武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清末民初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再次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梁启超根据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论述，提炼出大家都能听懂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名言，号召国人救亡图存。自此，这一口号成为唤起国人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的最强武器。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追求，也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身沉心不改”的爱国情怀

天下兴亡，“匹夫”为什么“有责”？这得从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时代背景谈起。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正值明王朝日渐衰弱，清政权强势崛起的动荡时期。明朝末年，国家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社会动荡不安，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关外于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并在1636年正式改国号为清，觊觎中原富庶之地已久。明朝廷内部却党争持续不断，内耗严重。而日益加剧的土地兼并，导致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1644年3月，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灭亡。旋即清军入关，定鼎北京，遂挥师南下，开始对整个国家进行血腥的军事征服。清政府入主中原，在顾炎武看来，这不仅仅是政权上的替代，更是中华文明传

承的断裂，如何保住“正统”文化，成为他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这一思想的产生，与顾炎武的家学传统和个人经历密切相关。顾炎武江苏昆山人，出生于江东望族，还在襁褓中时，就被过继给未婚早逝的堂叔顾同吉为嗣，由嗣祖和嗣母抚养长大。顾炎武从小就随嗣祖读《孙子兵法》《吴子》《左传》《国语》《资治通鉴》以及朝廷刊行的《邸报》，养成了他关注时事政治、关心现实民生的治学取向。未婚守节的嗣母王氏出生于书香门第，性格刚强，有着良好的文化教养，常给顾炎武讲述岳飞、文天祥、于谦等忠臣义士的故事，教导他做一个忠于国家民族的人。特别是清军攻占常熟时，嗣母虽幸免于难，但不愿苟活于世，绝食而死。她临死前嘱咐顾炎武要保住气节。嗣母绝食自尽的行为，深深震撼了顾炎武。

为尽“保天下”之责，顾炎武壮年投笔从戎反清，中年骑马北游续统统。1644年5月，南京的明朝残余力量拥护福王朱由松建立南明政权，年号弘光。顾炎武把恢复山河的希望依托于这个朝廷，受昆山县令举荐任兵部主事。并撰写了《军制论》《形勢论》《田功论》《钱法论》等文章，提出一整套复兴大计。只是他还未及上任，清军已占领南京，南明弘光政权覆灭。为了表明抗清的决心，顾炎武决定改名。他原名绛，字忠清。因敬仰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改名炎武。作为一介书生，他还在家乡积极参加苏州、昆山保卫战。家乡被攻占后，他以精卫填海的精神自勉，立下“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的誓言，奔走于太湖流域，积极开展抗清斗争，其间几经磨难，甚至险遭不测。

随着清朝政权的不断巩固，武装反清复明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顾炎武并未气馁，为了坚守理想，他决定北游，寻找“保天下”的治国良策。1657年秋，45岁的顾炎武开始了长达25年的“北漂”生涯。因崇尚儒学，他北上首站直奔山东，游崂山，登泰山，拜孔庙，寻觅名胜典籍，抄录墓志铭，查阅地方志，真正做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走遍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一边考察山川民情，结交志同道合的学者，徐图复国大计；一边探求学问，著书立说，寻求经世致用的救国救民之道。把实现民富国强的殷殷期盼写进《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日知录》等巨著中，以期“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